

# 公民道德的应然逻辑:反身价值

张 婷\*

〔摘 要〕 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长于灌输应该如何生活的理由,却拙于阐述“为何应该”。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是对“为何应该”的理性思考,也是公民道德教育必须予以重视的一般原理性问题。一个能对社会产生德性影响的公民一定是一个幸福、富有责任感的公民,而这样的公民也必然需要反身价值的支撑和保护。为此,学校道德教育需突显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以此增强公民道德对公民的内在吸引力和对社会的精神导引力。

〔关键词〕 反身价值;公民道德;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的臣民道德在经历了自然社会家族伦理的变异,政治社会国家伦理的狂热后,终于在20世纪末伴随着我国公共生活结构的转型,以及对传统道德文化中道德私人性的反思,萌生出对公民道德的理性追求。公民道德倡导的规则、权利、自由、平等这些理念,对于经历了千年臣民社会浸染的国度而言,更是极具诱惑力。因此,“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现已成为从政府到普通民众都极度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既源于我国公共社会生活健康发展对公民道德文化涵养的迫切需求,更源于公众对诸如“地沟油”、“老酸奶”、“假羊肉”等恶性事件的深恶痛绝。然而与这种“迫切需求”和“深恶痛绝”形成巨大的反差的是,公民在面临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时的无所适从,以及公民道德正能量的无法释放,于是公民道德被置于一个“极其被重视又极其被忽视”的尴尬境地。这让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关于公民道德的深层问题,那就是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实际道德行为的缺失,为什么会抵消了对公民道德的良好愿望?道德教育如何增强公民道德对公民的内在吸引力?如何增强公民道德的生机和活力?本文试论之。

## 一、反身价值:公民道德应该的理由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Adorno)曾言:“所有的异化都是一种遗忘”<sup>①</sup>。对公民道

---

\* 教育学博士,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教授,250022。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青年基金课题“公共精神视野中的大学公民道德教育研究”(CEA120116)系列成果之一。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1页。

德“为何应该”的遗忘导致公民道德教育偏离其本真而走向异化。受此影响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往往长于灌输“应该”，却拙于阐述为什么应该的理由。不可否认，公民道德教育要“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但是人们需要的却不仅仅是‘应该’，更想知道‘为何应该’。”<sup>①</sup>如果没有公民对“为何应该”的理性思考，就没有了公民对道德的自我认同，“应该”也就难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导，更无法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行为选择和生活事件中。显然，过往的公民道德教育更侧重“应该”的表述，忽视“为何应该”的作用，即使在少量“为何应该”的探讨中，更长于从抽象空洞的大道理层面来表述，鲜有结合公民个体日常生活实际的“应该”理由，最终公民道德教育被架空为纯粹的义务教育、限制教育和规范教育，成了实质上的公民苦难教育，缺少了温情和生机，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公民的内在吸引力。在一些宗教教义中也强调向善必受困难，但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苦难之后还设计了一个“天堂”，这个“天堂”就是向善的理由，而我们的教育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引导公众认识公民道德的“天堂”在哪里。因此，本文将公民道德的“天堂”，亦或“为何应该”的答案归结为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所谓反身价值是指公民道德主体在实施道德行为后，自身获得的道德回馈，这种回馈的最终结果表现为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与成熟，以及主观的幸福体验。

古语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体现的不仅是少存的“余香”，而是内心道德的强大生命力和道德“玫瑰”的自我再生力。即使从世俗价值的层面，反身价值也会体现为个体的受益和“有所得”。这种“得”可能是即时的，也可能是长久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社会的；等等不一。不过，反身价值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回报以及社会效益，更注重长期的、隐性的效益，即使“得”中含有物质或者经济的成分，也必

须进行合理的控制，反对等价交换。正因为如此，反身价值才使得公民道德成为一种激励性自律而非惩戒性自律，更不是任务和强加，而是试图与人的内在积极情感体验紧密相连，发挥道德“天堂”的内在动力作用。“道德是一种幸福的源泉，这种幸福不会因为享受而变得乏味，也是任何人不能夺走的。”<sup>②</sup>强调反身价值是公民道德的理由，意在强调公民道德一定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事情，它应该成为使自己愉快、强大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一个能对社会产生德性影响的公民一定是一个幸福、富有责任感的公民。

## 二、反身价值是一种怎样的理由

用反身价值来回答公民道德“为何应该”，其意涵意味着区别于传统公民道德认识的三种转向。具体而言，这种三种转向分别是：第一，从无私奉献到有所得的转向，肯定公民道德的反馈性。公民实施和参与道德行为后，会获得来自他人、社会和自我反向的“有所得”。这显然不同于过往公民道德教育和宣传中对无私奉献精神的过度强调。第二，从私民性到公共性的转向，肯定公民道德的公共特征。公民道德不同于我国传统的私德，它不只是仅限于熟人生活圈的个人德性修养，而是一种必须在公共生活中显现出来、与社会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公共德性；不仅强调事实层面的“我”，更关注价值层面的“公”。公民道德主观上表现为自身道德效能感的增强和道德的幸福体验，客观上表现为公众谋福利的责任感和采取良好公共行为的义务。第三，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向，肯定公民道德的参与性。公民道德不仅体现着公民享有的权利，也告诉公民应履行哪些义务，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不仅强调公民道德不是消极等待，更注重公民的主动参与，希望藉此改造

①[美]斯图亚特·雷切尔斯：《道德的理由》，杨宗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3页。

②陈根法、吴仁杰：《幸福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8页。

传统的顺从、盲目、被动的臣民意识,明确社会的事务是关乎每个人利益的公共事务。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好公民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献身于共同体的利益和福祉。只有如此,城邦的利益才能不断增减,而且个人也会在道德自觉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sup>①</sup>,这也是反身价值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这三种转向不仅将公民道德从偏离“为何应该”的轨道,重新拉回到对公民道德“应该”理由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还体现了丰富的人文关怀价值,从人的目的地位来把握公民道德为何应该的理由,也会随之恢复公民道德的生机和吸引力。

### **(一) 就个体而言,反身价值的反馈性是增强公民道德效能感的源动力**

一谈到道德,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认识,道德是牺牲自我的高尚行为,或是一种彻底的无私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在伦理学上被称为超道德义务,当然是高尚的值得肯定的。金生鈇教授认为,就个人而言我们可以将此作为道德理想,并选择这样的道德行为,但是就一个社会而言时,这种超道德义务显然无法成为公民道德水平的一般标准,不适用于所有公民。鉴于公民道德的全民性和最低限度性决定了肯定反身价值的“有所得”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自古就有“德得一致”的思想。早在《礼记》中就有:“德者,得也”的论断。东汉刘熙在《释文》将“德”解释为:“德者,得也,得事宜也”。许慎在《说文解字》进一步指出:“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意指“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福禄寿喜财”是中国普通民众向往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元素,其中“德福一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大德必得其寿”、“成小事者靠智,成大事者靠德”、“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在一定

程度上表达了德与公民生活“有所得”的内在一致性。

西方伦理史上也不乏持此种“德得一致”思想的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善性是获得幸福的方式。爱尔维修、边沁、穆勒等感性主义者认为幸福就是个人欲望的满足,但他们仍把道德义务和幸福相连,认为德行就是它自己的报酬。”<sup>②</sup>班杜拉(A. 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由于人对行为结果所能带来的功效产生期望,可能会主动性的进行这一活动。有学者与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理论比较后发现,高水平的道德推理并没有导致更多的道德行动,恰恰是自我效能感在由道德判断到道德行为的转化中起着关键的认知中介作用。显然,道德主体认识到公民道德反身价值的存在时,就意味着在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前,主观上意识到有权追求行为的“善”所产生的报酬。虽然这种“得”或者报酬不能作为承担道德责任的动机,但在客观效果和现实利益上却体现着对道德行为的肯定和认同,带来的是主体道德行为效能感的增强,成为公民道德行为持续发生的源动力。

### **(二) 就公共生活而言,反身价值的反私民性是完善公共生活的道德制衡力**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一种基于熟人世界的私民道德。尽管私民道德可以使一个人在进入公共生活时表现出优秀的品质,但其还是一种基于人性和人伦的个体美德,更适用于费孝通所言的熟人社会。显然这种私民道德无法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陌生人世界,无法成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制衡力量。另外,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先天伦理不足也逐渐显露出来。虽然公民开始拥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但大多数人的权利意识是残缺、不健全的,明显缺乏如何应用权利的能力,以及怎样去尊重他人权利和公共规

<sup>①</sup>张昌林:《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sup>②</sup>黄雁玲:《论道德回报的实质与心理基础》,《理论导刊》2010年第6期。

则的素养。显然,30多年来的物质丰裕是以巨大的精神舍弃为代价,市场经济为我们的物质生活打开一扇窗的同时,也关闭了道德那扇门。

公民道德反身价值的反私民性,一方面对于破除私民道德的禁锢、克服市场经济道德的先天不足和权利意识的残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反身价值关注价值层面的“公”突显了公民道德的利益互惠性,互惠是一种激励性的约束,更具有正能量,它更强调通过激发和培育公民对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在公民之间、社会与国家等之间构成有效的制衡关系,最终实现善行、秩序与利益的合理化。

### **(三) 对社会发展而言,反身价值的反被动性是通往文明社会的精神导引力**

改革开放在我国经济生活领域中引进了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社会公共文明的发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社会和谐文明的发展和成熟,仅有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公民道德文化的涵养和支撑。西方发育成熟的公民文化不仅体现在人权和公平观念的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敬畏公共道德法则的公民道德素养对社会文明进程的主动滋养。然而在我国,留在记忆中的“市场经济是公民道德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公民道德的政治保障”,诸如此类的表述显然表明的是公民道德的被产生、被作用的“被”状态,它所具有的“主动涵养社会发展的职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诚如林毓生在反思台湾的文化困境时所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公民道德的配合,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值的是公民的物欲,并使许多公民的生活方式趋向于低俗与褊狭。

现在看来,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来调整和完善。如前所述,反身价值的反被动性一改传统私德的范式,更关注价值层面的“公”。公民个人道德效能感的增强和幸

福体验的产生“成就的不仅仅是公民个人价值,而且也是共同体的价值精神”<sup>①</sup>,其结果可以导致在共同体中形成的一种凝聚力,而且由于这种凝聚力是发自内心的公民道德信仰,所以就具有了普遍性价值的功效。除了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外,公民道德的普遍性价值功效会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品质,时时反作用于市场、政府、社团、文化等的发展,这些昔日的制定者、监督者和旁观者转化为公民道德的实践场域。只是这些场域各自强调的道德重点不同,但都是公民道德的语言和实现途径<sup>②</sup>。正是基于公民道德之于社会发展本体意义的认识,中国和谐文明社会的成长才不能仅停留于制度结构的摹仿,更要实现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与融合,这才是促其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 **三、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 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不同时期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公民道德品质的差异,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差异。“一种道德最终能否被社会所接受,关键固然在于它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却取决于它的传播程度,取决于道德教育实施的好坏。”<sup>③</sup>因此,公民道德教育要想为人们接受,就需要道德教育重估无私奉献的取向,突显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突显利己的共同受益,以此增强公民道德对公民的内在吸引力和约束力。

### **(一) 反身价值要求道德教育还原公民道德的人本意义**

“公民道德”一词在我国的正式引入始于19

<sup>①</sup>陈玉君:《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sup>②</sup>A. Wolfe, “Market, State, and Society as Codes of Moral Obligation”, *Acta Sociological*, no. 32, 1989, pp. 221 - 236.

<sup>③</sup>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9页。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过渡时代”(梁启超语)。这个作为西式个人主义文明产物的词汇进入我国后,却无力摆脱国家本位价值观的支配,其蕴含的词义被绑架在了中国传统“以德治国论”的思维模式上。公民道德被工具化处理,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国家本位,而非追求道德本身。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更习惯了将道德本质定位于“利他”否定“利己”,甚至是绝对化的无私利他;道德功能定位于“制约”否定“发展”;道德目标定位于“神圣”否定“平凡”;道德体验定位于“苦中作乐”而非“幸福满足”。在这个时期,道德的去利己性、去回报性成为主流。其实,这是对道德的误解。殊不知,道德不仅仅是教化问题,更是一个普遍的人本需求问题。因此,从精神层面上讲,道德中的自我需要、自我回馈退居其次,甚至被直接剔除后,公民便无从体验到自我德性发展的主观幸福感,无法感受道德对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魅力,也就无从谈起认同并践行公民道德,公民道德的利公价值更是无从实现。因此,道德教育突显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不仅有助于从理论层面还原公民道德的人本意义,也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恢复公民道德应具有魅力和内在吸引力。

## (二) 反身价值要求道德教育体现公民道德的回报认同

就公民个体而言,公民道德应是纯义务的,不可有道德利己的掺杂,否则会影响到公民道德的纯粹性和高尚性。然而,就外在的社会环境而言,公民道德则不应是纯牺牲性的单向付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应建立健全道德回报机制,这既是对公民道德反身价值的认同,同时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道德是出于义务和信念的行为,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或多或少地以自我牺牲为前提。但这并非意味着道德的本性就是自我牺牲,尼布尔指出:‘社会将公正而不是

无私作为它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标是所有人寻找机会的均等。’因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要求个人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的那部分道德学说,即归于无私名义下的有关一切要求,不适合运用到一个国家的活动上去,否则在培育‘道德的人’的同时很可能造就了‘不道德的社会’。”<sup>①</sup>

为此,制度化的公民道德回报机制对公民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宗旨不是强迫,而是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巩固善行,在保护主体道德权利的基础上设计道德回报制度。在美国,有源自古老圣经故事“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 Law)”的“好心人免责条款”,其规定: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而出于内心道德要求无偿对他人进行救助时,虽出现了救助失误仍可免责。另外,从一般意义上讲,公民行为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是道德理性、道德实践、特定场景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偶然性和变动性为道德风险的存在提供了潜在可能。因此,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规范体系,还可以对可能出现的漏洞加以补救。

## (三) 反身价值要求道德教育彰显公民道德的发展功能

受国家本位的影响,我国的道德教育历来将国家和社会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政治因素的介入更使其社会限制、约束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公民道德具有限制和约束的社会功能,但限制和约束不是公民道德的根本取向。如同,威廉·弗兰克纳所言:“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的好的生活,而不是对个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sup>②</sup>由此,道德教育不仅要“使人感受到掌握与遵循某种道德规范对自身来说是一种约束、一种限制、一种牺牲、一种奉献,而且应当使他们从内心体验到,从中可以得到愉快、幸福与满足,得到自我充分发展与自由,得到惟独人才有的一种最高享受”<sup>③</sup>。传统限制性道德教育

①黄瑞英:《道德世界的幸福何以可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

②[美]威廉·弗兰克纳:《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黄伟合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③鲁洁:《德育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5页。

只能解决公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公民道德的发展却恰恰是一个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道德教育突显反身价值可以使公民从内心体验到道德实践后的幸福和满足,认识到自我获得充分发展的一种自由和享受,这一切都会转化为公民道德后续发展的强化物。

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确,公民道德的反身价值不是一种独立彰显的价值,不具有终极目的

意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具有手段性价值亦或工具性价值,但它却始终指向、服务于终极意义和利公价值的实现。这一道理简单而深刻:一个能对社会产生德性影响的公民一定是一个幸福、富有责任感的公民,而这样的公民也必然需要公民道德反身价值的支撑和保护。

(责任编辑:蒋永华)

## Why Civil Morality Should Be Done: Its Reflexive Value

ZHANG Ting

**Abstract:** In our country, so far the civil morality education seems to be more inclined to indoctrinate people with “we should follow the moral conventions” than to enable them to understand “why we should do so”. The reflexive value of civil morality is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why we should follow moral conventions”, and it is a basic problem that civil morality education has to resolve. A person who can generate moral influence on society must be a happy and responsible man, who also needs support and protection of reflexive value. Therefore, 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should highlight the reflexive value of civil morality, which can strengthen the inherent attractiveness of civil morality and the spiritual guidance of society.

**Key words:** reflexive value; civil morality; moral education